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就在长空下/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就有那大树的常青/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 倾听新中国大使夫人的讲述

# 先锋

翟晓光◎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HOUSE

翟晓光◎编著

# 先锋

倾听新中国大使夫人的讲述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ED AND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锋——倾听新中国大使夫人的讲述/翟晓光编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4

ISBN 7-80109-846-3

I. 先…

II. 翟…

III. 外交人员—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957 号

## 先锋——倾听新中国大使夫人的讲述

---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 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 //www. cctp. com. cn

E - mai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64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

# 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

TING MAMA JIANG GUOQU DE SHIQING

这是一卷珍贵的历史档案，绝大多数照片都是第一次面世。

它提供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传奇之一——中国女性解放的故事。在这条漫长的、血与火、情与仇交织的道路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披荆斩棘一路走来，是这条道路上的开路先锋。也许大辩无言，也许大音希声，多少年天地翻覆，多少次花开花又落，她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讲述自己；在她们身上，有着当代人最为稀缺的美德：那就是母亲般的平易与谦逊。无论作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迹，哗众取宠对这代人而言就是卑劣，标榜自我和宣传个人为她们所不齿——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因为她们是相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革命者。

在所谓“口述史”流行的今天，本书因而不愿也不能披上“Oral History”的学术外衣。因为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我从来不想隐瞒自己的立场，在我看来，对于那些借口述史来宣扬革命给女性造成伤害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她们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对于现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旁观者”立场。正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旁观者”立场，使他们不能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没有政治的平等与解放，女性的权利就不知从何谈起，而追求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从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公布第一部宪法申诉女性的政治权利以来，为了实现这些权利，正如本书所揭示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代女性付出了怎样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本书的立场毋宁是斗争性的，因为今天某些人力图刻意制造一种叙述，去抹煞和否定中国妇女革命和女性解放的历史，这些叙述的制造者既有存心不良的男人，也有自以为摩登的女人。一个民族不能以“无知者无畏”为时尚，何况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提供的“讲述”，对每一个倾听者而言，既是一个可以在当下安身立命，堂堂正正作一个“女人”的宝贵遗产，更是对于未来世界的展望。因为这些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既与历史上的花木兰一脉相承，也依旧是未来女性解放道路的先锋。

正如逝去的诗人骆一禾的一首诗所写道的：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象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他就在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常青  
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 目录 MU LU

---

木兰辞 ..... 朱霖 ( 1 )

从边城走向世界 ..... 赵兰香 ( 47 )

传奇 ..... 朱黎青 ( 83 )

琳琅锦绣 ..... 刘锦琳 ( 125 )

# 木兰辞 MU LAN CI

■朱 霖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子，是党和人民教育我走上为人民、为民族求解放的道路，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女共产党人告诉我说，要少想自己，多看看国家和社会，我希望我的一生是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朱霖，83岁。

原名文佩卿，1920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司马村一个农民家庭。

1937年参加太行地区抗日游击斗争。1938年，18岁的朱霖在抗日游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在晋冀豫解放区党代会上，作为党代表的朱霖与时任晋冀豫军区政委、区党委军事部长的黄镇邂逅并结为伉俪。

1941年6月，朱霖由太行二区地委党校教务主任，调八路军129师组织部干部科担任营级干事，参加了包括百团大战、十字岭战役等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经历了太行山斗争全部的艰苦岁月。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朱霖被提拔为正团级干部，荣立二等功。1948年从太行山区调入河北平山县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3月，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入北京。

1951年1月，奉命由总政干部部调入外交部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大使夫人，并主管大使馆党务工作。

1954年11月，作为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并担任二等秘书，亲自参与了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的保卫工作，并陪同周恩来参加了会议期间的主要外交活动。

1961年5月至1964年6月，担任外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外组组长。

1964年5月作为首任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夫人，担任一等秘书。

1973年5月，和黄镇主任一起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

1977年回国后，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纪委副书记兼国内部部长。

1978年在全国妇女第4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常委，1983年被选举为全国妇女第5次代表大会中直和国务院代表团团长。

1982年9月30日离休。

我是1920年2月，也就是1919年羊年的腊月出生的，我的二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文佩卿。

我的老家是山西孝义县的司马村。我们文家也是穷人，我的爷爷耕地，早年去世。我的二爷爷文天龄在北京琉璃场当学徒，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给家里买了十来亩薄地和半个院子。但是我小时候，家里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记得三爷爷常拉我到处借钱，到年关就更是借高利贷了。那时候，我家一年四季吃两顿饭，早饭总是米汤、料窝子，就是用牲口料黑豆、高粱磨成粗粒子，蒸出来是又红又黑。除了过年，从来没吃过好饭。

我从小感情脆弱，胆子很小，长大连鸡狗都不敢摸一下。7岁上学，既不聪明，也不伶俐，学习成绩差，常被打手心。家中也无人帮助我。在北京的二爷爷三年回来两次，他给我讲历史上的花木兰，讲我们家是宋朝文潞公的后代，有时他拍着我的脑袋连连叹息，说：“可惜你是个女孩子！”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

我们家在司马村还不是最穷的，而我外婆家则可以说生活在最底层。外祖父过世后，全靠外祖母养家，完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母亲14岁嫁到文家，18岁生我，又遇难产，再未生养。父亲在北京学徒的时候沾染上抽大烟的恶习，几乎不顾家。母亲经常以泪洗面，哭着说：“你可要给我争口气啊！”我那时候很小，就对她说：“妈，你



1937年，朱霖（前排右三）参加铭贤中学抗日救亡宣传队，登台演出话剧，演出后，全体演员合影。



1935年，朱霖（前排右三）参加铭贤中学成立的童子军。

“不要怕，以后我养活你！”

我的二奶奶、妈妈、二婶都是非常善良的妇女，她们做在人前，吃在人后，与世无争。

我的二姨嫁的是个破落户，跟着丈夫住马厩。为了养活丈夫和女儿，二姨到汾阳和太原去当了妓女，40岁害脑溢血就死掉了。二姨的女儿也很不幸，二姨死了以后，她和姨夫生活更艰难，待到父亲去世，她把父亲埋葬后，就吊死在马厩门前，她只比我小一岁。

三姨13岁那年被卖给文水县城南村一个38岁的男人作为妻子，受尽了虐待，自杀了四次。上吊、吃砒霜、吃烟土、钻水缸，都被救活了，死都死不成。三姨是我陪送她去文水出嫁的，她才13岁。

四姨比我小一岁，被送到汾阳城学山西中路梆子。抗战前好不容易要出师了，却被教练活活踢死在舞台上。

我母亲的姐妹们命运就是这么惨。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分家另过，搬到汾阳城。父亲靠给人家跑腿，母亲为工厂工人洗衣服拆被子，家里刚好了一点，没想到房东的儿子对母亲起了歹意，调戏不成，就找人把我父亲抓进牢房里，那个家伙在模范监狱当书记。父亲被抓走了，母亲哭个不停，我去看守所给父亲送饭，看到满地躺的都是人。三爷爷随我们过，他经常对我说，这个汾阳城就这么可怕啊！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只好停学，跟邻居到工厂砸核桃。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是谁都可以欺负的，就这么忍着，从天不亮到黑天，只能挣一两毛钱。就这样，三爷爷和妈妈还是很高兴的，一毛钱可以买二三斤小米或高粱面。等父亲从看守所放出来，我已经停学一年。复学后，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跟不上学习，只好留一年级，这个时候我真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可以少受罪。小孩子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我上高小期间，已经有媒人来提亲，让我嫁一个下肢瘫痪的富家子弟，这样一辈子就可以不愁吃穿了。我对父母说，你们要是答应，我马上死在你们面前。他们就我这么个女儿，也就没有答应。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十三留头十四嫁，十五养个胖娃娃。”穷人家的闺女真是没办法啊。

1935年，我15岁，高小才毕业，我当时想如果能进初级中学三年，毕业后就能穿白大褂当个护士养家。当时我的三叔文广华在太谷铭贤中学教书，我就写信求他，他答应了。临走，母亲从旧货摊子上买了两片黄夹帘子做成被子，父亲拿出在北京穿过的绸夹袍，妈把它染了一下，给我做成棉旗袍，又将她结婚时穿的三尺半上衣，给我改成单旗袍，我一个人坐火车去太谷，一路上就怕丢掉了行李。

太谷铭贤中学是美国奥柏林大学基金会创建的，经过三叔的申请，学校免了我一年的学费100元。我只能住在三叔家里，省了食宿费。三叔每月的薪水只有30元，一家三口加上我，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为了少看三婶的脸色，我就努力多干活，学习压力又大，经常晕倒在地上。三叔怕我得干血癆，带我到医院，人家给了50粒维他命保命，我自己舍不得吃，捎给了乡下的二奶奶。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个人救助了我，她就是学校女生部主任徐焕之老师，他的爱人是共产党人，牺牲了。徐老师在初中女生住的红楼里给我找了间耳房，不收房费，离三叔家也近，她还说：你不要老想自己，应该抬头看看国家和社会。

住进学校后，我休息的时间多了，接触同学的时间也多了，还有了看课外书的机会。我最初看的是巴金的《家》，一边看一边哭，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了进步思想，像绝望的落水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这个时候北平一·二九运动波及到我们学校。我的音乐老师王文辅是冀东人，他在课上讲亡国奴的痛苦，师生一起痛哭流涕。我那个时候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而且还登台演话剧，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母亲从旧货摊子上买了两片黄夹帘子做成被子，父亲拿出在北京穿过的绸夹袍，妈把它染了一下，给我做成棉旗袍，又将她结婚时穿的三尺半上衣，给我改成单旗袍，我一个人坐火车去太谷，一路上就怕丢掉了行李。

我只能边哭边说：“婆婆，我以后养活你！婆婆，我以后养活你！”我就这么一跺脚哭着走了。

就这么一跺脚离开了我的家，从此一去12年。

我1938年在游击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全国的党员最多也不过三五万人。

我愿意和朱总司令姓一个姓，希望普降红色及时雨，从此改名为朱霖。

我从一个愁眉不展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活跃的人。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

1937年我三叔被学校解聘了，我只能回家为学费想办法。到了老家，二爷爷已经落魄地从北京回老家了，他给了我10块钱。我去看了我的外祖母，她衣衫褴褛，头上的虱子乱爬，背驼着，腿弯着，正在用麦秸烧火做饭。这副模样让我痛心疾首。她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养她，而且个个命运都那么惨，我只能边哭边说：“婆婆，我以后养活你！婆婆，我以后养活你！”我就这么一跺脚哭着走了。

就这么一跺脚离开了我的家，从此一去12年。

没有钱，学是不能再上了，也正赶上日本侵占山西，学校要搬到大后方。我那个时候经同学石玉瑛介绍已经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我决定不走，要走就跟着“民先”走。当时“民先”要组织抗日游击队，我就和学校的50名同学留下来，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我就是在这种家破国亡的时候，参加革命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组织领导有杜润生，他建国后是我们党内的经济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是个大知识分子。有八路军129师派来的老红军蒋克诚、秦基伟等，在这个大家庭里不但吃饭不要钱，有那么多个哥哥大姐姐们照顾，我头一次感到非常充实、幸福。

打游击是非常艰苦残酷的。刚刚参加革命不久，也就是在1937年11月，队伍到达榆社县城北的峡口村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个老农从北边缓缓步行而来，同志们说，那就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进太行山了，后面随行的还有大作家丁玲同志。见面后同志们欢呼起来，要总司令讲话。

我1938年在游击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全国的党员最多也不过三五万人。我感到自己得到了新生，真正的生命开始了。

1938年初，榆次地委调我去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党校由区委书记李雪峰同志和委员们领导并亲自讲课。到了党校，因战争的环境非常复杂，所以要求大家都改名字。我愿意和朱总司令姓一个姓，希望普降红色及时雨，从此改名为朱霖。这就是我今天的名字。

1939年春天，当时我19岁，党校毕业，回二地委党校任教务主任。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黄镇。当时石玉瑛同志要给我介绍爱人，我表示反对还同她吵了起来。有一天，晋冀豫军区在我们党校开会，军区请我作会议记录（笑——我当时警惕性不高），我发现坐在台上的一个人总在看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黄镇。黄镇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帅气



1939年9月，朱霖同时任晋冀豫军区政委兼军事部长的黄镇结为伉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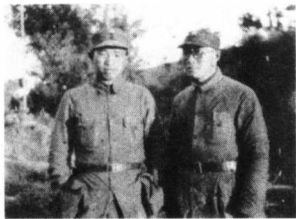
的。在会议休息时，他去看我作的会议记录，我也没有太上心。我开始不太同意，黄镇托石玉瑛给我捎来一只自来水笔和一个笔记本，当时一只钢笔就是奢侈品，我就觉得他是在用东西引诱我，很生气，把它扔了，是石玉瑛悄悄收起来没有退回。从此他自己来找我谈，也不断来信，我们才相互了解起来。

1939年秋，区委召开党代会，我是代表，他是晋冀豫军区政委，也是晋冀豫党委军事部长，我们碰到一起，他提出结婚。我明确提出我的顾虑：一、他是高干，我信不过，怕被玩弄；二、我要坚持工作，决不当首长老婆；三、不愿生孩子，怕妨碍工作。黄镇当即表态接受。黄镇当时有两句话，打动了我。他对我讲：“我一定以无产阶级之道德，共产党员之品质来对待你。”50年的历史表明，他对于我提出的第一、二条真是说到做到，只是第三条未能实现。

当时解放区还没有结婚登记仪式，经组织批准，组织部长给双方谈话就行了。我们是在区党代会期间结婚的，除参加会议的领导外，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康克清同志一来就问黄镇：你的迫击炮是哪一个？——当时长征的时候，开玩笑说：男的叫“机关枪”，女的叫“迫击炮”。

1940年夏天，百团大战前，急性赤痢流行，已在死人。那时我在区党委党校工作，参加春耕检查工作后，被传染了赤痢，每天还拄着

我明确提出我的顾虑：一、他是高干，我信不过，怕被玩弄；二、我要坚持工作，决不当首长老婆；三、不愿生孩子，怕妨碍工作。黄镇当即表态接受。



1940年8月18日，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黄镇和刘伯承师长在山西和顺石拐镇百团大战前线指挥所前。

当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背着背包和部队跑步过漳河，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战场上最怕的就是掉队，一个女兵如果掉队是个什么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

棍子去讲课。雪峰同志知道了，马上让校医老红军罗医生治，他把长征时带来的德国阿米丁给我打了，要不是这一针，我恐怕早已经不在人世了。痢疾虽然好转了，但却变成了慢性，这么一拖就是9年。

1941年6月，我调到129师组织部担任干部科营级干事。当时女同志在野战部队是非常困难的，在一次女同志的座谈会上，有人发言说，敌人扫荡这么频繁，女同志在部队会增加拖累。还有人说，在反扫荡的时候，一个女同志骑在马上，一个老红军就指着她的背说，老子身上有许多窟窿，还骑不上马，你身上有一个窟窿，却能骑大马？我虽未骑过黄镇的马，但听了非常难堪。我下定决心：我是女同志，是来革命的，绝不会输给男同志。

当时黄镇是政治部副主任，他让我住在组织部，避免同进同出，因为当时结婚的人很少，必须注意影响，我见他一面，也跟做贼似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加紧了对太行山区的扫荡。1941年秋季大扫荡的时候，为了迷惑敌人，总是敌人离我们驻地非常近的时候，领导才下令转移。当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背着背包和部队跑步过漳河，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战场上最怕的就是掉队，一个女兵如果掉队是个什么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拼命跑啊，上下山时，我有意跳沟、蹦脚，只感到肚子疼，肚子里的孩子却纹丝不动，这个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1942年2月春季反扫荡，为了机关能迅速转移，领导决定让将要临产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我，还有另外两个女同志四个大肚子单独去打游击，只给了两个手榴弹。由产科医生马芳晓同志和一位文化干事带路，我们就在敌人堆里穿行，怀着身孕一夜能跑50多里路。

临产前最后一夜，我们从山上下到一个敌人刚刚烧抢过的小村——涉县的林旺村，烧的房子还在冒烟，好不容易找到两间小房，其他三个同志住进去，我只好住在驴圈里。我和马医生赶紧清除驴粪，把驴吃草的木槽清出来准备放孩子，边干还边开玩笑说：“朱霖你要成玛丽亚了”。

我们四个人都顺利分娩，当时汪荣华同志拿出刘师长给他的一个月津贴，一共5块钱，黄镇托人送来了两只鸡，我们就靠这些东西做了月子。

产后我总是伤心落泪，马医生问我原因，我说我就是不愿生孩子，怕妨碍工作，我是来革命的啊！我要求她快帮我处理孩子，结果就在我生产后第七天，马医生骑了一头毛驴，把我的女儿揣在棉袄里，沿

途向老百姓讨奶吃。回到政治部驻地王堡，才在温村找到一个奶妈，交给人家抚养。黄镇当时在三分区指挥作战，敌人的一发炮弹打中了跟他在一起的郭国言司令员，他却没有受伤。他回来就抱了一下孩子，说很好。其实孩子当时已经得了红眼病，脸上还生了疮，已经不是刚生下来时的样子了。



1942年2月，刚刚做了母亲的朱霖和大女儿二乖。在战争年代，黄镇一直把这张照片珍藏在皮靴的夹层里。

两个月之后，5月大扫荡又来了，敌人用兵三万，就是所谓铁臂合围。这次扫荡前，129师把机关干部也都武装起来了，黄镇这次被派往六军分区，任务是牵制敌人主力；敌人分九路而来，空陆并进。出发前，我到黄镇的小屋前站了一会儿，心里想，不知道下回是否还能见面。我决心宁死不当俘虏，他忙着收拾东西，看了我一眼，彼此无言。

我和政治部同志跑步离开王堡，与敌人周旋。那次反扫荡，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从辽县撤离上山后，被陆空并进、超过我们20倍的敌人层层包围了，我们凭险与敌人血战。最危急的时候，是彭老总等同志杀开了一条血路，才突围出来。也就是那个时候，左权副参谋长坚决要求留下，继续组织突围，结果和许多干部战士牺牲在十字岭上。那次牺牲了左权同志，是党和军队的很大损失。罗瑞卿和郝治平是黄镇和六分区的部队救出来的。

敌人包围总部的战斗还未结束，李达参谋长派警卫员来找我，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女同志都知道，激战之后，最怕首长找谈话。果然，他告诉我黄镇的电台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了，有人说他腿部负伤，又掉到了山下，就是活着也残废了。之后很久都没有黄镇的消息，我也不好打听。

6月初，我们129师机关和边区政府，又在黄岩村一带被15000敌人包围，形势十分危急，师直部队在前面与上山的敌人血战，政治部在蔡树藩主任指挥下，先进黄岩沟，等待夜间突围。到了那里，大白天，发现敌人已经围上来了，他们没打枪，觉得我们已经是囊中之物了，蔡主任立即命令大家顺沟向西边的高山上跑。我因为是产后，身上背着组织部的机要材料和干粮袋，没有其他男同志跑得快，同志们就拖着跑，往山上爬。等我们爬到西山顶，下面部队已经和敌人交火了，我们下不去了。

太行山天气酷热，石头一晒，烧饼都能烤熟了，人人口干舌燥，这个时候水就是命。一阵激烈战斗的间隙，同志们喊快下山，因为我们的部队打走了控制唯一水源的敌人。我们跑下山直往肚子里灌水，谁也没有水壶啊。

接着往西北方向突围，又遇到了敌人，把我们压在沟底。这时候已经找不到水喝，看到石头凹里有一滩牛羊喝剩的水，里面夹杂着牛羊的屎尿，我一下子就喝了五碗，好象还很渴。这时候看到蔡主任的爱人陈书涟同志从石头缝里舀出一碗水来给我，里面还有小蛤蟆蝌蚪

6月初，我们129师机关和边区政府，又在黄岩村一带被15000敌人包围，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候已经找不到水喝，看到石头凹里有一滩牛羊喝剩的水，里面夹杂着牛羊的屎尿，我一下子就喝了五碗，好象还很渴。

在游，也顾不得了，三口两口就喝完了。

敌人马上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迅速撤离，我就抓住组织部直工科长韩连生同志的皮带，跟着他，跑过了这段危险地带。就在这次反扫荡中，光政治部宣传队，就有三个女同志在隐蔽地被俘。

我们就这么突围行军。夜里，遇到了区党委书记李雪峰、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一家，包括他们五六岁的儿子小胖子。只见小胖子用绑带捆着腰，妈妈拉着绑带，小腿走得还不慢。干部和战士们就拿出碗来说，小胖子，尿点尿吧，叔叔太渴了！小胖子发愁地说，你们都来要，我没尿啦！

后来才知道，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因为两千多机关干部没跟上他们一起行动，担心极了。师长说，那个队伍就象背着玻璃电灯泡赶集，经不起碰，有个不测，我怎么向同志们和中央交待啊！实际上，要不是他将新一旅布置下来阻击敌人，掩护我们，我们很难突围出来。直到我们都突围出来，他才松了口气。

突围出来路过温村，同志们让我去看看孩子。奶娘正在给孩子喂奶，一见我就欣喜地说：“你们可回来了”。其实敌人来了，奶爹在山上掏了个洞，把孩子和奶娘藏在里面。敌人在外面打死个村里人，把奶娘吓得拉了一裤子尿尿，可是孩子却睡得呼呼的。奶娘说这八路军的孩子真命大啊，要是当时她哭一声我们娘俩就全完了。

曾随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到太行山来的常之华同志，拿出小照相机，把孩子和奶娘摄入镜头，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过了好多天，黄镇打了胜仗回来了，他也没落成残疾。

那是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岁月，残酷的岁月。

1941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前门有“狼”，后门有“虎”。为提振士气，还要加紧生产。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自救组、宣传队到处演出。我们自编自演活报剧、大合唱《太行山》等进行文艺演出。当然还有《雷雨》和《日出》。为了配合整风，还演《钦差大臣》、《蜕变》，那是非常有水平的。为了把干部战士练成“钢铁的身体、钢铁的意志”，师政治部举行了各种别开生面的活动。

只要是农忙季节，干部、战士都下田劳动，减轻人民的负担。当时的生产部长张克威同志是美国的农学博士，抗战爆发，抛下老婆孩子回太行山抗战。他当时规划了一个水利工程，引水上山，在河滩上改造良田，后来在太行山还种出了稻子和金皇后玉米。老百姓编民谣唱：水流南山头，吃饭不用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

干部和战士们就拿出碗来说，小胖子，尿点尿吧，叔叔太渴了！小胖子发愁地说，你们都来要，我没尿啦！

敌人在外面打死个村里人，把奶娘吓得拉了一裤子尿尿，可是孩子却睡得呼呼的。奶娘说这八路军的孩子真命大啊，要是当时她哭一声我们娘俩就全完了。